

力、适应力和恢复力。而这些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前后两段的核心议题，皆为新时代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讨论空间。如果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检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试验场，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设置了许多西方现代化理论既没有给出也很难给出答案的新问题。在实践上，党扮演了其间最核心的角色；在理论上，党史研究也不应该“失语”。于古今之间、中西之间重新构建历史坐标、重新评估党的作用，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便是党史研究的新的叙事。

当然，新的现代化叙事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它正如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已然站在了一个临界点上。历史性与政治性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可谓如影随形，只是旧的形态蜕去，依稀见得蝶影。这既可说是党史研究的一条创新之路，亦可说是一条返本之路。在这一新坐标之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党史叙事，也将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之路。

(本文作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概念与话语：深化中共党代会研究的新维度

陈红娟

党代会是中共重要的政治仪式，历次党代会构成了中共党史发展的主干脉络。以往党代会主要作为重要史料隐没于事件史、断代史研究中，整体性与专题性研究相对薄弱。党代会研究一般在召开当年或次年达到研究高峰，之后以纪念性研究为主。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物、议题、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贡献和意义的评价式叙事以及思想与精神的宏观性阐释，呈现纪念性和宣传性研究多，微观实证、横向比较等原创性研究不足的特点。近年基于党代会文本的词频统计与语料分析展开的观念史、话语分析研究日渐兴起，概念与话语成为党代会研究的新视角。概念表征思想，话语反映特定的事实经验，立足于经验之“实”同时以语言之“名”的概念与话语，承载着言说者思考特定议题以及如何解决特定议题的意义与价值系统。概念与话语本身具有建构性，尽管党史研究依附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言说的视角、立场、阐释方向与意义生产亦影响着史实的呈现。毕竟，“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①。党代会的概念与话语既是中共社会实践的抽象提炼，又通过文本传播生产意义、形塑信仰作用于社会实践。党代会的概念、话语、命题与论断，为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学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必要将党代会文本中的主流政治概念和话语融入党史研究，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政治动员与增强政治认同的功能。

一、澄明概念：多维度透析党代会文本概念的语义指涉

党代会承载着提升价值理念认同度和凝聚民众向心力的政治功能，是中共建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每一次党代会都会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这些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经过时间的荡涤彰显特定意义，连接着新的经验、价值与预期，是研究中共思想的重要切口，“思想、理论的发展，本质是概念、判断、推理的发展，同时也会伴随术语的变化”^②。当然，党代会文

① (英)彼得·帕克著，贾士衡译《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289页。

② 王金福《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中的术语、范畴问题》，《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

本中的有些概念和表述具有过渡性，可能会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而消逝，但那些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存在的概念与范畴，特别是在党代会文本中不断被确证、夯实并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与范畴则值得深入探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史研究应辨明二十大报告中那些持续性和稳定性概念被赋予哪些新的语义，传达怎样的言说意图，指向何种行动。

长时段视野中辨明党代会标识性概念的能指所指。概念随着历史语境的重构而不断被“时间化”，一个概念在重要政治文本中不断被复述、强化、赋义、扩展，也就是实现核心化、标识化的过程，其所经历的时代性变迁赋予了应然性的研究价值，从而成为值得研究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便是如此，经历了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习近平“七一”讲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再到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语词演变，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本身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从具象向抽象的跃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既承继历程演变中那些沉淀的意义，也存在着新的语义建构与塑造。“现代化”从最初以英译词“Modernize”“Modernization”出现于在华西文报纸到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零星使用再到30年代《申报月刊》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自身的语义经历了从进步、改善、改革、革命、维新到机械工业、产业革命等方面的演变^①。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不同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语义内涵、能指所指亦大相径庭。邓小平1979年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种低阶水平的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②。然而，二十大报告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一种高阶水平的现代化，是能够引领时代发展、对一些国家产生吸引力的现代化，也是具有可借鉴、可推广、蕴含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的现代化。毕竟，概念一旦与“式”“模式”关联，就意味着其自身抽象性、普遍性与共识性意涵的提升，并被赋予识别性与推广性的价值功能。可以说，党代会文本中类似这样的概念都值得展开历史性分析，祛除概念的误置，辨明概念语义的代际替换过程，明晰当下语境中概念语义指涉和政治功能，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国际比较视野中探明党代会标识性概念的对话交锋。任何概念在言说时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意图，政治概念更是肩负着交锋、说服、协商、战斗的使命，党代会标识性概念更是如此。新时代以来，中共政治概念的时代化、国际化特征日渐彰显，以单元概念为基点在国际领域中展开意识形态交锋愈加激烈。这里依然以“现代化”为例展开分析。“现代化”概念产生于冷战时期，从提出之初就被赋予了“传统—现代”“先进—落后”“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同一事物在两种不同坐标体系下的言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时主要是与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相区别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解蔽“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迷思，凸出现代化的多元性。“中国式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使用，确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二十大报告中政治概念的“强音”，其概念厘定不仅有助于开展与西方现代化的对话、交锋与争辩，而且有助于改变从西方现代化提取思想资源的现状。概念在使用中不断竞争与博弈，政治概念的时代化与国际化凸显着在比较视域中揭示概念使用意图与功能的现实诉求。当然，这也为党史研究提出了新挑战，需要研究者站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建构中进行洞悉、观察与比较。

总之，概念厘定是阐释党代会思想与精神的前提。党代会文本蕴含着中共的政治智谋和话语策略，文本概念的选取、界定、修辞、解释与使用经过层层打磨与锤炼，并被赋予指示性、竞争性意

^① 黄兴涛、陈鹏 《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义，其语义指涉与价值功能有必要展开深层次学理分析。

二、话语革新：理清历次党代会文本中同一话语的衍化方向

党代会发挥“领航”作用，每次党代会都“反映着党在这个时期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基本意志，反映着党的一系列重大抉择背后的思想理念、运行状态和领导能力”^①。党代会作为政党政治仪式，既要实现对旧有集体记忆的回溯，又要通过政治语言符号的强化、拼接、叠构、形塑新话语，维护、支持与夯实新命题与新判断，实现意义生产，制造并强化新的集体记忆。同时，党代会文本与同时期的其他重要政治文本相互观照，毕竟“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②，共同见证政治话语出场、复苏、转换、退场甚至再出场的过程。深化党代会研究，有必要观照中央全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重要领导人讲话等重要政治文本，在互文性文本中爬梳话语出场、构筑、维系、退场、再生的过程，管窥中共思想的变迁与衍化。如果党代会的概念研究主要聚焦于语义功能、助力于中共政治智慧阐发的话，那么历次党代会的话语分析则致力于话语演变与言说策略以透析中共思想的源流演变及其背后的致思轨迹。

党代会中政治话语的革新与转换隐喻着思想的重生与再续。与打造全新话语体系相比，既有话语革新更易于政治稳定与大众容受，因此政治话语往往由相对稳定的话语群构成。党代会文本中的一些关键性话语亦脱胎于已有的知识脉络与话语链条。革命话语就非常典型，它经历了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自我革命的话语嬗变。革命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的阶级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是话语建构的中心。政治革命以变更政体、改朝换代为目的，党代会文本主要用词有“革命进攻”“革命政权”“肃清反革命分子”等。改革开放以来，革命话语难以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产生集体认同，一度从主流话语转变为辅助性话语，日渐式微甚至被边缘化。词语的使用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纵观历次党代会报告词频，革命词频下降拐点是从十一大报告的225次下降到十二大报告的28次。然而，毛泽东曾指出“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③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话语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革命对象从政权转移到生产力、体制、产业、科技等社会领域，如何通过革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话语建构的中心议题。党代会报告的语词亦发生变化，十三大报告与十四大报告中的主要表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一场新的革命、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斗争精神”等革命话语以新的形式重新彰显于政治舞台。与之相对应，党代会报告中的革命语词频次出现回升，由十八大报告的10次上升到十九大报告的20次。新时代以来，如何实现自我监督、自我革新是中共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革命话语在党的建设领域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与意义归属。革命以自我革命的方式重新在政治领域得以延续，再次成为中共实现政治动员、群体认同与集体行动的重要符号。这也促使一些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研究中形成的“革命—建设—改革”话语代际更替的论断，从话语延续与转换角度重新展开政治话语的历史书写。总之，深化党代会研究，有必要开展党代会语词的词频统计与语料分析，于最高峰值、最低峰值的转折处中探究中共政治话语体系的迭代更新，定位党代会本身在重新规范话语秩序与编织意义之网中的价值。

党代会中政治话语嬗变与更替意味着意义的扬弃与再构。党代会报告呈现了“历史—当下”的叙事逻辑，蕴含着话语承诺与实践期许，在指明政治话语建构方向的同时，实现了对以往话语意义的解构与重建。正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等思想要素陆续进驻，‘社会主义’概念意涵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并成为全社会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

① 李忠杰 《党代会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引领作用》，《新华日报·思想周刊》2022年11月8日。

② 王瑾 《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力”^①。新时代革命话语保留着以往革命话语中的既有要素，同时随着“四个伟大”中的“伟大斗争”、“三个务必”中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思想要素的进驻，革命话语被赋予新的意义，实现了意义层面的创新性发展。一是注重革命的正向意义生产。革命有双重性，即彻底性破坏和建设性对抗。与此前政治革命以革“他者”之命为目的开展的运动式暴动与政权颠覆不同，自我革命实现了革命对象从他者向自我的转移，更加注重正向政党形象的生产与塑造。二是革命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新时代的革命不再是蕴含冲突、暴乱意味的短暂而剧烈的社会运动，不再是意味着杂糅无序化的历史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意味着自我革命将被嵌入到制度建设之中，长期、有序而规范化开展。当然，党代会报告自身也有相应的话语互嵌，如自我革命的中心议题之一——反腐败斗争，在二十大报告中表述为“攻坚战持久战”，革命的持久性与长期性语义不断被夯实。可以说，从阶级革命转向社会革命、自我革命，革命话语不仅实现了对革命原初意涵的拓展、转移、突破甚至变异，形成新的话语张力，而且实现了行动指向的根本性转化。深化党代会研究，有必要探究文本话语转换蕴含的暗示、表征以及意义重构，揭示其背后的行动指向变革。

总之，话语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思想流变的过程，有必要对历次党代会文本中的同一话语展开思想考古与观念谱系分析。在时间序列中历史化地厘清党代会文本中同一话语如何实现分化与代际更替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透析话语在语境转换中不断实现重心转移、语义消解、弱化与延续的过程，而且有助于明晰话语与其他话语重组过程中重新出场、相互支撑、结构维系并不断被赋义的思想逻辑。

三、话语互动：整体审视党代会文本中话语链的耦合联动

历次党代会见证着中共政治话语秩序的建构过程，见证着主题性话语与其他话语的联动与耦合。就话语本身而言，除了受到历史语境的规约，还与文本语境中的其他话语互动、互构，共同型构着文本的整体意义。与一些哲学家注重话语的差异、离散、断裂与非一致性研究不同，党史研究更注重“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②，强调思想的连续性、统一性、一致性、整体性和内聚力。因此，党代会话语研究亦应注重对话语链间的互动、召唤与黏连展开整体审视，呈现思想发展样态，“注意当前话语链中主要话语的改变及其与其他话语链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从历次党代会的主题词来看，主要贯穿三条话语链即“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这也与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范式取向相对应。不过，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共百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基础上增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这也促使学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已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形成“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④。不过，范式研究注重对某一类主题性内容的筛选，容易造成主题间的离散或割裂。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的研究更注重三者各自的话语衍化，彰显着彼此间的分化与疏离。比如有学者就指出：“今人如若只是看到当时两种史学范式间（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引者注）的矛盾紧张关系之单面，不曾见及其彼此相连相通之另面，也容易陷入某种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中。”^⑤历史发展本身具有复杂性，具体历史情境亦存在着多种元素与力量的冲突、耦合，“话语分析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对一个话语链或一团相互交织的话语链进行历史性的分析与现实相联系来分析”^⑥。

① 郭若平 《思想史场域：中共概念史的政治因应》，《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②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③ 朱人求 《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④ 陈金龙 《百年历史主题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1期。

⑤ 黄兴涛、陈鹏 《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⑥ （德）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朱毅译 《福柯的迷宫》，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5页。

从话语链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复兴话语、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三者本身交织融合地贯穿于中共党史发展历程的史实，是党史研究形成三种范式的内在根据。三种话语链本身并不冲突，亦不存在优劣之分。相反，观照中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实然演进过程，三者从不同参照与坐标共同阐释了中共党史。如果说党代会文本的话语分析是从中观层面展开思想源流探讨的话，那么话语链条之间的互动研究则更注重从宏观层面开展党代会思想发展的整体探究。

党代会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之间彼此渗透、相互缠绕与作用，存在着话语的共联、叠构与互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许诺性话语，内嵌着政治共识性预期，隐含着未来民族发展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较的语义预设。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具有合法而强势的意识形态性，发挥着民族凝聚与精神感召的政治功能，是革命或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民族动员与民族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而革命与现代化则是施行性话语，表现为许诺下的言语行动，为复兴提供着经验事实与实践动力，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与革命话语曾一度相互支撑，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强势崛起，最终成为全面共享的政治语言符号，并转化为全民抗战行动的重要助力。现代化话语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在党代会文本中经常并列提及且同向共行，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话语与革命话语亦互动融合，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望历史，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勃兴与流行就是知识分子对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代诉求的整体关怀，政党亦是在建构现代化的政治想象中实现革命动员的。观照当下，自我革命引领的社会革命亦嵌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塑着现代化的面貌与样态。

综上所述，与分立式研究不同，从大历史观、大党史观的视角出发，当前应更注重三条话语链条之间的融合共进研究，以整体性研究思维厘清党代会中中华民族复兴话语、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之间的融合互动，探明党代会在不同时期使用何种话语策略处理三条话语链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共怎样的实践诉求与行动指向，它们如何在互动中作用于中共实践、影响社会心理并凝聚思想共识等一系列新问题。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

瞿 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意义深远、继往开来的重大命题，为“四史”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开启了更深入的诠释空间和更深刻的理解维度，目前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关于中国革命，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我们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①。这段话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点和大格局都揭示了出来。本文拟从此基本点和大格局出发，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进一步讨论。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70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